

# 新时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肖洪根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 中国香港)

**摘要：**本文从科学范式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3个角度，结合科学范式取向与知识生产过程3个场域之互动，对新时代中国旅游研究的问题与视角，展开讨论与阐释。本文讨论了新时代中国旅游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与研究视角，指出以多学科交叉融合、学术共同体代际转向、产学研联动互动为特征的新时代中国旅游研究，是促进理论建设、推动更佳实践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科学范式；知识生产；新时代；中国旅游；旅游学

[中图分类号] F59

Doi: 10.12054/lydk.bisu.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38 (2018) 02-0016-11

## 一、与时俱进的中国旅游

近十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国家发展战略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旅游已成为社会福祉与生活质量的代名词。在社会经济转型中，中国旅游与时俱进，发展重心正经历着由“传统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向“井喷式发展的国内旅游与蓬勃兴起的出境旅游”的转变。通过产业融合与产品更新换代，中国旅游将继续利用自然环境与自然风光、文化遗产，并借助现代交通与“互联网+”等现代通讯信息技术，进行可持续发展。

与时俱进的中国旅游，已显著地（并将持续）表现出以下特点：（1）产业进一步融合，边界逐渐模糊。旅游业将进一步与传统农业、工业/制造业相融合，并衍生出形式多样的农业旅游、工业旅游等发展形态；文创产业、实景演艺、主题公园等产业进一步相互融合；休闲产业、户外游憩、康体/医疗/养生旅游与健康产业交融并进。在产业进一步融合、边界逐渐模糊的背景下，以服务经济、休闲经济、共享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将日益

[收稿日期] 2018-03-01；[修订日期] 2018-03-07

[作者简介] 肖洪根(1965—)，男，福建将乐人，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与文化、休闲与社会、中国旅游、知识发展。

增大。(2)在“旅游+”与“互联网+”理念指导下,旅游新业态层出不穷。如,以精品、体验、便捷、小巧等特色见长的“非标准住宿”新业态与传统酒店业共存共荣。(3)二元视野下的社会文化变迁将继续表现出全球与本土、历史与现代、富裕与贫穷、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等现象与形态。在这一语境下,区域发展不平衡、乡村旅游、旅游扶贫等问题,是新时代旅游发展的重点课题。(4)旅游与公共服务相互促进、日臻完善,城市综合发展与旅游地/旅游景区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5)国际旅游大环境不断改善,签证手续进一步简化,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ADS)数量继续增加。这些措施将进一步促进出境旅游的发展。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旅游发展已自觉融入国家综合发展战略,成为实现中国梦、唱响“一带一路”、建设美丽乡村、推进精准扶贫、丰富大国外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全域旅游”成为新时代中国旅游的全新发展理念,是中国旅游发展在现阶段的自然选择(李金早,2016a/2016b/2016c)。

## 二、新时代中国旅游研究

本文试图从科学范式与知识生产层面(Kuhn, 1962/1970; Guba & Lincoln, 1994),讨论中国旅游研究问题,特别是现阶段中国旅游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有关问题。文章拟通过反思科学范式取向与知识生产过程之场域互动来展开(见图1),分为3个部分。首先,对科学范式的立场与取向展开讨论,介绍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框架内,“未知、已知、知者”在知识生产中的互动;并评述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等范式相关联的方法论取向问题(Guba, 1990; Phillipore & Goodson, 2004)。其次,文章就社会科学范式与知识生产场域互动对新时代中国旅游研究的启示,作了初步的反思。这些观察与思考大都源于笔者这些年与《旅游学刊》、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中国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研究院、一些地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以及部分内地大学旅游院校等机构与组织的合作与互动,有些也来自笔者对以中国旅游发展为主题的会议之参与及观察。笔者从事的主要工作是旅游高等教育、旅游学术研究,以及旅游学术组织与学术社团服务(如从事本科及研究生教学、指导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开展与旅游知识发展相关的基金项目研究、发表科研成果、从事旅游学术期刊编辑与审稿、编撰英文版《旅游百科全书》、组织以旅游发展趋势为题的国际论坛等)。最后,文章从社会科学知识跨语言

传播的视角，就新时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作了简单的尝试性思考，并以此作结。

### 1. 科学范式与知识生产

从科学范式 / 科学哲学之层面审视，知识的生产，微妙而又复杂地表现为：“未知 (the unknown)、已知 (the known or knowledge)、知者 (the knower)” 3 个场域，在“本体论 (ontology)、认识论 (epistemology)、方法论 (methodology)” 3 个层面的互动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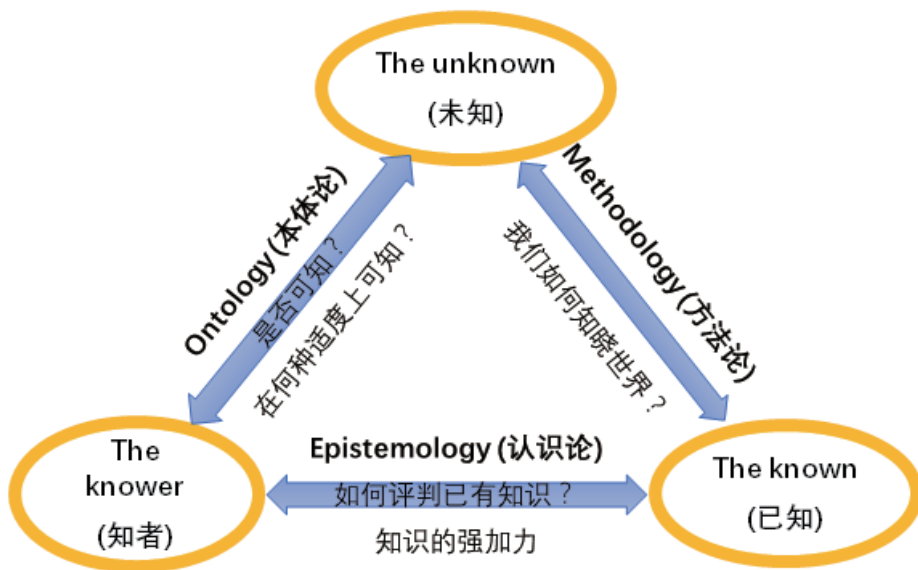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科学范式与知识生产场域互动

Fig.1 Social science paradigm and field interactions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首先，就知识生产的 3 个场域而言，研究课题探索的“未知”世界，具有异彩纷呈的本体属性，既有“外在于知者”的客观存在（如：纯粹的物质世界以及社会、群体与个体所表现出的思想世界），也有“内在于知者”的主观世界（如：知者或行者的内心世界与意识 / 精神空间）。从“外在于知者”的客观存在，向“内在于知者”的主观世界，依次地思考旅游“未知”的本体属性。旅游活动及其发展对“空气、水、土壤”等对象的影响，是一种可知的客观存在（如：民航排放与全球变暖、酒店洗衣设备的排放与空气质量变化、高尔夫球场维护中的水土与环境问题、冬季度假地 / 国家公园里的滑雪活动对土壤的破坏）。相较于上述问题的绝对客观性，诸如“一带一路框架下，沿线国家的旅游合作”等问题，虽然其本体属性仍然“外在于知者”，但对象的客观性则是相对的，课题的考量会涉及国家战略、社会 / 经济发展、文化与旅游政策乃至具体企事业单位（或群体）的发展选择等具有价值判断或价值取向的方面。

在个体层面，以旅游学的核心问题（“人们为什么去旅游？”）为例，旅游动机所对应的那部分个体的“思想世界或内心深处”，一部分是“外在于知者”的客观存在（针对于“研究者”而言），另一部分则是“内在于知者”的主观世界（针对“被调查对象/知情人”而言）。社会学家丹恩（Dann, 1981）在关于旅游动机研究评述一文中，曾指出该本体属性给方法论的提出带来难题，因为“游客本人都无法或不愿意把自己的动机告诉研究者（unwillingness or inability of tourists to disclose their motivation to the researchers）”。因此，旅游动机只能是一个“部分可知”的问题。再往“内在于知者”的内心深处/主观世界走，旅游哲学、旅游与存在、旅游与自由、旅游与自我改变（tourism and self-change），以及近几年在国内外以群体或个体方式不时出现的反思性旅游学术研究，都属于把“内在于知者”的研究者自身视为研究对象。这在很大意义上，抹消了“知者”与“未知”的距离，使两者合二为一。

因此，一个课题所对应的现象/现实是否可知、在什么程度上可知，是本体论思索的核心问题。围绕课题所对应现象的本体属性，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分别在“现实主义”（realism）与“唯心主义”（idealism）两种视野下展开。科学研究与知识生产，究竟是为了客观如实地描述现实世界（describe reality as it is），抑或是仅仅描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主观认识（perceptions of reality），这一直是社会科学范式对话的两个焦点。因此，在本体属性层面，思索并追问“新时代中国旅游（发展）的本质（特质）是什么？”“什么是‘全域旅游’？”等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

其次，从“已知”的视角（认识论层面）看，知识有“显性”（explicit）与“隐性”（tacit）之分。显性知识大都见之于有形的、可出版（或已出版）的文献；而隐性知识则是人们在生活与工作中长期积累的、无形的经验、工艺或技能。各行各业中，这类“知识”，或因为其内涵的微妙与复杂，或因为语言表达能力的苍白，未能从隐性转变为显性；但这类经验、工艺与技能，是人们从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习得的宝贵知识财富。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旅游的认识论问题则表现为“什么是中国旅游的‘已知’？”“如何认识与评价中国旅游研究已取得的知识成果？”“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知道了什么”“中国旅游研究的知识来源是什么？知识是如何生产/创造出来的？”“哪些是绝对知识（如果有的话）、哪些是相对知识？”“现有的理论与方法如何影响今后中国旅游研究的开展？”等。围绕本体属性主/客观对应的两大立场，对上述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便产生了“实证/后实证主义”（positivism/post-positivism）与“解说/建构主义”（interpretivism/constructionism）两种相互对应的科学范式。“实证/后实证主义”

范式，把客观性（objective）、绝对性（absolute）、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等特征视为知识的本质。“解说/建构主义”则认为，社会科学的知识是积极主动的（active）、相对的（relative）、主观的（subjective）、调适性的（adaptive）、情景具体的（contextual/context specific）。此外，在作认识论思考时，“实证/后实证主义”的研究，从理论/知识出发，提出假设、检验理论模型；而“解说/建构主义”的探索，则提倡保持理论敏感、避免知识桎梏与理论约束（Foucault, 1974）。

再次，从“知者”的视角，在技术手段上，“如何开展新时代中国旅游研究？”是方法论以及方法技术层面的核心问题。研究者需针对问题的本体属性，结合学科理论方法与个人专长（当然有些时候也受限于课题的目的、性质、时间、经费、团队等“实际”因素，另见：Tribe, 2006; Tribe & Liburd, 2016），作出相应的范式取向、方法论思考乃至技术层面的方法选择（Crotty, 1998）。如上所言，除却少量针对“纯粹物质世界”（如空气、水、土壤）开展的研究以外，绝大多数旅游社会科学探索需要通过被试者（respondents）或知情人（informants），来生成意义或经验知识。因此，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知者”的两重性（某种意义上也是两面性），加剧了范式选择与意义生成的复杂性。一方面，知识的客观性要求研究者（尤其是实证主义范式下的工作者），面对被试对象保持客位（etic）的身份与距离，以期生成的知识（理论或模型）具备普适性；另一方面，知识的相对性与主观性则要求研究者（尤其是解说/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探索者），对参与者或知情人保持主位（emic）态势，因为只有融入其中、保持零距离、建立相互信任，才能深入探究问题的答案，挖掘深层的意义，把握互动过程中的“相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与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共建性/同构性（co-construction），讲述饱满的故事。通常，这类主位研究还需要讲述“她/他们的”故事，让她/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giving voice to participants）。在很大意义上，“知者的两重性”赋予质性旅游社会科学以人文视野与美感。

在方法技术（操作）层面，主位的研究，要求“知者”（研究者）保持“开放态势”，不带着假想（假设）进入问题，面对“已知”（已有的理论与文献）保持高度的理论敏感（theoretical sensitivity），置身于“自然的”数据情境与研究（分析）过程之中，以“归纳”的方式生成理论或意义。其研究设计与执行过程是灵活、动态的，研究结果也是能反映研究者主体价值观的。与此相反，客位的研究，则遵循“演绎”的逻辑，在理论指导下，依据“已有知识”（科技文献），提出假设并检验理论。研究者是价值中立的，为了表明知识



的客观性，甚至其研究报告的撰写，也是不允许体现研究者主体（“我”或者“我们”）的。

## 2. 研究问题与理论视角

在社会科学范式与知识生产场域互动的框架下，“现阶段中国旅游是什么？”“旅游（发展）为了什么？”“如何看待已有的中国旅游（隐/显性）知识？”“如何开展今后的中国旅游研究？”，是探索与讨论新时代中国旅游发展的核心理论问题。

中国旅游发展所框定的学术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已形成围绕社会/社区/行业发展、着眼主/媒/客体互动的官、产、学、研联动态势（Xiao & Smith, 2006; Xiao, 2013）。这些群体、社会网络或组织机构，在任务与分工上，虽然各有侧重，但学术共同体内部信息的关联与共享（包括研究信息共享与科学知识转移），又使得这些群体之间保持着连续不断的交流与互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关系重叠与界限模糊），推动着各自的认识与实践。从科学范式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这些群体内部已各自形成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知识，对旅游发展现象（现实）以及各自面临的课题与挑战有自己的预判，对如何解决具体问题也有从各自角度出发的决策模式与方法过程。

具体而言，旅游学界、业界以及政府主管部门，都有自己的“已知”与“未知”。在“已知”方面，知识应用的研究发现，行业经营管理者更多的是凭借隐性知识或从业经验，而不是钻研学界发表的科研成果，来开展日常工作，指导管理决策（Xiao & Smith, 2007）。在“未知”方面，困扰行业经营管理的问题，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实操性、场景性及个案性。因此，行业实践部门提出的研究项目与学界的科研课题，通常视角截然不同。从“知识”与“知者”的互动关系上看，隐性知识或行业经验是否也有“桎梏”效应？是否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制约“行者”的创造性思维，影响知识创新以及自由开放态势的展现？如是，官产学研的视角、各自面临的课题、问题轻重缓急的预判与排序，就都可以在知识生产场域互动的情景中，以三角推论（triangulation）的方式，在不同数据来源、不同方法技术、不同研究者（研究团队）、不同知识范式与理论视角之间，展开相互印证与考量（Oppermann, 2000; Denzin, 2012）。

在宏观层面，旅游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配合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旅游局近期推出了有关全域旅游、厕所革命、旅游外交、旅游扶贫、乡村旅游/美丽乡村建设、“一带一路”与旅游、旅游警察等一系列政策，推进了新时代旅游的政策实践与发展实践。作为对政策实践与行业发展动态反应快速敏捷且回应程度很高的应用社会科学/管理科学领域，

中国旅游研究应该提出问题、找准视角，对上述政策实践与发展实践的理论意义进行深入的探索。

以“全域旅游”为例，虽然相关的政策文件或工作报告已对此作了解释并给出了定义（李金早，2016a/2016b/2016c），但对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所对应的现象/现实之本质（或本体属性），是缺乏深入认识的。新时代旅游研究还需对此方面作深入的理论探讨，例如，针对目前中国旅游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为何“全域旅游”可以成为转变思路、创新战略、变革模式、加快阶段演进，以及实现从景点旅游向全局旅游、从小旅游格局向大旅游格局转变的一种思想理念？如何理解“全域旅游”理念的本质（如这一理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升社会福祉、改进生活质量、增加幸福感与获得感、彰显文化软实力、实现“由经济入从文化出”等层面的真实含义）？“全域旅游”与“社区范式”（community paradigm）有无本质区别？政府主导下的旅游发展目标，究竟是“从外到里、为了好看”，还是“由里到外、标本兼治”？全域旅游是“从外到里”，还是“由里到外”的发展？如何科学规范地检验、描述以及解释全域旅游赖以实现的九大转变？（李金早，2016a/2016b/2016c）

宏观的研究，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对新时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特质，开展经验性观察与描述；其二，对新时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特质，进行理论概括与总结。这些研究将有助于产生中国本土的、宏大的旅游理论，质疑或挑战传统以来一直主导全球旅游研究思维范式、在客源地与目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框架下衍生出来的种种西方公认的旅游发展理论（如经济依赖理论、后殖民时代文化再现理论、社会文化变迁机制理论等）。

在微观层面，针对新时代中国旅游现象及其发展现状的阶段性和复杂性、文化性、区域性等本体属性特点，未来（或当代）旅游学还可以对中国旅游发展的局部现象或具体问题作微观的透视。“好奇”（curiosity）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原动力，这类“小题大做”的探索，有助于理论与方法的自主创新，易于与中国独特的旅游发展情境相结合，产生具有阶段性/区域性/局部或地方解释力的理论表述或概念模型。这类微观的研究，既可以提出新理论，也可以有效地描述或解释新时代旅游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微观视野下的选题，通常会由于“知者/学者”的浓厚兴趣、学科训练与方法素养、独到的视角、对“未知”现象与现有知识的把握等原因，让读者对一项研究感到耳目一新、振奋甚至身心愉悦。

带着人文学科背景、质性社会科学的思考以及对旅游基础理论的关注，笔者就其中相关的一些问题与研究视角，作如下表述。

(1) 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独特情境中, 旅游与休闲的本质是什么?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旅游在“劳动/工作-休闲”二元框架下的作用与位置, 以及由此延伸的旅游与健康、旅游与生活质量、旅游与舒缓工作/生活压力、旅游与(劳动/社会关系)异化等思考。

(2) 不同社会群体与个体(如儿童、妇女、老年人、弱势群体、旅游发展的受害者、资源匮乏/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等)如何看待身边特定的旅游发展形态(或业态)? 如何因地制宜地看待旅游与贫困的关系? 如何评价旅游作为缓解贫困的工具或手段?

(3) 近二十年来中国城乡旅游发展的同质化趋势明显, 在强大的趋同惯性作用下, 旅游地的差异性与地方感逐渐丧失。因此, 关注不同类型的旅游发展形式(形态), 对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所带来的程度不同且性质各异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环境的影响, 是很有意义的一种微观视角。

(4) 旅游过程中(或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伦理(或伦理学)问题。例如, 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太空/天体的关系、人与“无人”的关系(如机器人、无人操作装置)、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等。展开讲, 例如, 在形式多样、涉及动物参与的旅游业态中, 如何从游人角度讲述动物的故事(游人如何看动物)? 如何从动物的角度讲述游人的故事(动物如何看游人)? 社会科学乃至动物科学的研究工具, 是否可以帮助研究者有效地认识游客体验与动物体验(或动物认知)? 人与自我的关系, 则可延伸为“旅游与自我发展”“旅游与自由”等基础理论课题。

(5) 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说, 国际旅游是出入境国家之间的民间外交。国际旅游兼具文化属性与消费属性。面对入境游客, 如何开展文化展示与文化再现以实现目的地国的文化传播? 出境游客如何扮演“文化使者”的角色? 旅游增进文化了解、尊重文化差异、实现地区/区域和平的路径在哪里? 由此递进, 这类思考还关联到“旅游与国家形象建设”(nation-building/nationhood)、“旅游与文化自信”(如China-watching或Chineseness)等课题。

(6) 游客从旅游过程中(城乡居民从身边的旅游发展中)所感知与认同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问题。在改善民生、全面提升生活质量的政策背景之下, 如何从经验观察上, 破解“通过旅游实现幸福、体验获得感”的难题。

不言而喻, 上述示例只是笔者思维惯性下的一些随想。不同的研究者, 结合自己的学科背景、兴趣关注点与文献涉猎, 会提出不同的问题, 找到不同的视角。

总之, 在中国社会科学日益强调自主创新的今天(景天魁, 2018), 新时



代中国旅游研究,定会在多学科交叉融合、学术共同体代际转向(保继刚、张捷、徐红罡等,2017)以及官产学研联动互动的大背景中,发展宏观与微观本土理论,推动更佳实践。

### 三、中国旅游研究思想与知识传播

新时代中国旅游的发展理念与发展实践,其意义与影响将远远超越旅游领域。“旅游将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增就业、惠民生的新引擎;成为新型城镇化 and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载体;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新动力;成为促进中国融入世界旅游大潮、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新举措;成为自身提质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抓手”(李金早,2016a/2016b/2016c)。

从科学范式与知识生产的意义上说,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旅游研究如何在宏观、微观两方面,还错综复杂的旅游现象以其固有的本质属性或本体特质,将对旅游学理论发展、旅游教育与学科建设以及新时代的旅游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中国旅游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在目前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伴随出现(也不可回避)特定阶段的新问题。例如,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看,中国本土化的宏大旅游理论是什么?何时(有望)出现?微观层面的旅游研究是否必须在本土化宏大理论与概念体系指导之下开展?同时,如何科学研究与评判新时代的旅游发展理念,也是对学术界提出的一大课题。

最后,从知识转移与知识传播的意义上,中国旅游研究本土知识的溢出及其对世界旅游知识的贡献,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价值观博弈与话语权转移,也是今后旅游知识发展研究必须高度关注的课题。

#### 参考文献:

- [1] Crotty M J.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Research* [M]. London: SAGE, 1998.
- [2] Dann G M S. Tourist motivation an appraisal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1, 8 (2): 187~219.
- [3] Denzin N K. Triangulation 2.0 [J].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2012, 6 (2): 80~88.
- [4] 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M]. London: Tavistock, 1974.
- [5] Guba E G. The alternative paradigm dialog [M] // Guba E G. *The Paradigm Dialog*. Newbury Park: Sage, 1990.
- [6] Guba E G, Lincoln Y S.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 // Denzin N K, Lincoln Y 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Sage, 1994:

105~117.

- [ 7 ]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M ] .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 8 ] Kuhn T S. 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s [ M ] // Suppe F.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Urbana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0.
- [ 9 ] Oppermann M. Triangulation-a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 J ]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 ( 2 ) : 141~145.
- [ 10 ] Phillimore J, Goodson L.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ourism : Ontologies, Epistemologies and Methodologies* [ M ] . London : Routledge, 2004.
- [ 11 ] Tribe J. The truth about tourism [ J ] .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 ( 2 ) : 360~381.
- [ 12 ] Tribe J, Liburd J J. The tourism knowledge system [ J ] .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6 ( 57 ) : 44~61.
- [ 13 ] Xiao H, Smith S. Towards a paradigm shift of knowledge : Implications for 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 J ] .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2006, 2 ( 4 ) : 385~422.
- [ 14 ] Xiao H, Smith S. The use of tourism knowledge : Research propositions [ J ] .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4 ( 2 ) : 310~331.
- [ 15 ] Xiao H. Dynamics of China tourism and challenges for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 J ] .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3, 2 ( 1 ) : 1~3.
- [ 16 ] 保继刚, 张捷, 徐红罡, 等. 中国旅游地理研究: 在他乡与故乡之间 [ J ]. *地理研究*, 2017, 36 ( 5 ) : 803~823.
- [ 17 ] 景天魁. 摘掉社会学的“紧箍咒”: 一味用中国的微观材料去验证西方的“公认理论”, 怎么可能摆脱学术附庸地位? [ N ]. *北京日报*, 2018-01-15.
- [ 18 ] 李金早. 从景点旅游走向全域旅游 我国“十三五”旅游发展开创新局面 [ EB/OL ] . [http://www.cnta.gov.cn/zdgz/qyly/201601/t20160129\\_759445.shtml](http://www.cnta.gov.cn/zdgz/qyly/201601/t20160129_759445.shtml), 2016a-01-29.
- [ 19 ] 李金早. 全域旅游大有可为 [ EB/OL ] . [http://www.cnta.gov.cn/zdgz/qyly/201602/t20160207\\_760080.shtml](http://www.cnta.gov.cn/zdgz/qyly/201602/t20160207_760080.shtml), 2016b-02-07.
- [ 20 ] 李金早. 全域旅游的价值和途径 [ EB/OL ] . [http://www.cnta.gov.cn/zdgz/qyly/201603/t20160304\\_762201.shtml](http://www.cnta.gov.cn/zdgz/qyly/201603/t20160304_762201.shtml), 2016c-03-04.

##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XIAO Honggen

( School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SAR, China )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flects up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on China tourism and its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The essay unfolds itself in a paradigmatic context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unknown, the known and the knower for its knowledge production. Multi-/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of members in its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the dynamism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amongst its academics, industry professionals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s are identified and discussed as defining features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Hopefully, these emerging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offer promis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ory and betterment of practice of China touris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paradigm; knowledge production; new era; China tourism; tourism studies



### 《旅游导刊》在 2017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排行榜排名位居前列

在近日发布的《2017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中，《旅游导刊》进入工商管理学科期刊排行榜。在 254 种涉及全文被转载的工商管理类期刊中，《旅游导刊》以 17.14% 的全文转载率排名第 4 位。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发布，是基于复印报刊资料学术论文转载数据研制的、评价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和教学科研机构的学术研究成果，每年 3 月定期发布。

自 2017 年 1 月创刊以来，《旅游导刊》秉持“引发讨论、引导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办刊理念，在读者、作者和审稿人的支持下，学术影响力不断提高，已初步发展成为旅游学科中一个新的对话平台、学习平台和交流平台。